

马修斯  
儿童哲学  
三部曲

# 童年哲学

加雷斯·B·马修斯 著  
刘晓东 译



The Philosophy of Childhood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

# 童年哲学

---

加雷斯·B·马修斯 著  
刘晓东 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THE PHILOSOPHY OF CHILDHOOD

by Gareth B. Matthews

Copyright ©1994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童年哲学 / (美) 马修斯著; 刘晓东译. —北京: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10 (2016.6 重印)

(马修斯儿童哲学作品)

ISBN 978-7-108-05324-4

I. ①童… II. ①马… ②刘… III. ①儿童教育—教育哲学 IV. ①G6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4573 号

责任编辑 胡群英

装帧设计 薛宇

责任印制 宋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375

字 数 124 千字

印 数 6,001—9,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致莎拉、贝卡和约翰

For Sarah, Becca, and John

.

## 为中文版写的序言

我还是个五岁的孩子时，和我的一个朋友一起挖地，我们自以为挖了个很深的洞，计划是要挖成一个游泳池。

我还能记得当时我们很好奇：要是我们继续不断地挖下去，我们将挖到哪里？

“你将挖到中国”，我被告知。我们一直挖就能直达中国这个念头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确信当我童年时和朋友一起挖的洞实在并不很深——可能仅是一米，当然不可能超过两米，现在引起我兴趣的想法是什么？是我作为当年挖地时绝不可能做到的事，那就是我的关于儿童哲学思想的著作，将在中国出版。我希望这将有助于引起新的重视，如果不是为了发掘，至少是为了幼童的思想。

加雷斯·B·马修斯

于麻省阿默斯特

## 引言 开悟

那是 1963 年，我第一次将哲学与童年联系起来。我家的猫当时生了跳蚤，我对家里人说要去地下室，用熏烟的办法给它灭跳蚤。我大女儿莎拉才四岁，问我能不能同意让她跟去看看。我勉强同意，但有个条件，那就是她得站在楼梯的高处，以免吸入灭跳蚤的烟尘。

莎拉站在楼梯口看我灭跳蚤，兴致很高。过了一会儿，她问：“爸爸，猫身上怎么生跳蚤的呀？”

“噢，”我漫不经心地回答，“它肯定跟另一只猫玩过，跳蚤就从那只猫身上跳到这只猫身上了。”

莎拉想了想。“那只猫怎么生跳蚤的？”

“噢，那只猫肯定跟别的猫玩过，”我自以为巧妙地回答，“跳蚤蹦到那只猫身上，又从那只猫身上蹦到咱家猫的

身上。”

莎拉顿了顿，较真地说：“可是，爸爸，跳蚤从这只猫身上蹦到那只猫身上，再蹦到别的猫身上，不能这样蹦个没完吧。只有数字才数个没完。”

这件事发生时，我正在明尼苏达大学教哲学。我所教的几门课里有一些公认的话题，其中之一就是力图证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论证（the Cosmological Argument）。这一论证必须排除原因的无穷回归，以便证明“第一因”的存在。圣托马斯·阿奎那异常镇定地让我们相信，“第一因”就是我们大家所称的“上帝”。记得当时我心说：“我在教大学生们‘第一因’的论证，可我四岁大的女儿独自提出了‘第一跳蚤’的论证。”

那个时候我对发展心理学还所知甚少。噢，不过我对让·皮亚杰（Jean Piaget）还是知道一点点的。我曾听过他的讲演（是法语讲演！这对我可是个挑战），当时我还是哈佛大学哲学专业的一名研究生。我当然知道皮亚杰著名的守恒实验。但那时我还不知道皮亚杰理论根本不关注我年幼女儿所进行的此类哲学思考。按照皮亚杰的理论，她还处于“前运算思考”（pre-operational thought）阶段的前期。

我还记得，在聚会时我经常时不时地谈到莎拉和跳蚤的故事。但我可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把它当作实例，来

揭示这样一种观念：正如莎拉一样，许多幼童会自然地自发地进行哲学思考。当然，我当时尚未意识到哲学与童年之间存在许多关联。我希望此书能提出并讨论这些关联。

跳蚤事件过去六年之后，我在马萨诸塞大学得到了教职，所以我们举家搬到美国东部。我到马萨诸塞时恰巧发生了所谓“学生动乱”（我认为简单称为“学生动乱”是相当勉强的）。我新到的这所大学不断发生罢课、炸弹威胁和数不清的游行。我自己是非常反对越南战争的。所以，尽管我从学校已经毕业十年，我依然参加了一些“学生动乱”活动。我不止一次地挤在满是抗议者（大部分是学生）的大巴上，去华盛顿示威抗议。

这时候，我注意到我哲学课上有一个现象逐渐让我开始烦恼。我的一些学生向我表示怀疑：哲学是“权势集团”转移高校学生（尤其是男生）注意力的一个阴谋，它试图让学生的注意力从越战所引发的生死攸关的问题转移到哲学上。并非我的所有学生都在怀疑，但一些最引人注目的学生是有这种怀疑的。

怎么会有人怀疑我心爱的哲学是权势集团的阴谋？我很伤心。我不知道如何回应。人们该怎么处理这类怀疑呢？

幸亏有新泽西州蒙特克莱（Montclair）儿童哲学促进中心的马修·李普曼（Matthew Lipman）及其同事的开拓



性工作，哲学现如今已经进入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学校课程。可是二十年前，在反越战的那个“动乱”年代，哲学几乎只是高深的大学学科，而学生在上大学之前是不大可能接触哲学这类课程的。任何对“权势集团”哪怕有一点点怀疑的人，都可能发现这样一类课程安排有些居心叵测。

至于我个人则相信，哲学确有部分内容，可以帮助学生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思考得更有深度和更加清晰，但有更多的内容不能提供这种帮助，至少不能直接帮上忙。我并不想将对诸如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或阿奎那的“宇宙论论证”的讨论，硬与诸如正义战争理论或者道德限度问题扯上关系。

有天夜晚，我给我儿子约翰（当时三岁左右）讲一个睡前故事，我蓦然想到这篇故事所引发的哲学议题正是我计划在次日要与大学生讨论的。因而第二天我便将故事带到课堂上。上课伊始，我阅读了从家里带来的这篇故事。（我已记不清这篇故事的题目，但有可能是詹姆斯·瑟伯 [James Thurber] 的《许多月亮》[*Many Moons*，已出中文版译为《公主的月亮》]，我的孩子们全喜欢这个故事。这篇故事异想天开地谈及感知的错觉，尤其是月亮外观上的大小尺寸。）“你们还能记得小时候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吗？”读完故事后，我问学生。随后我接着说：“如果你们还记得，今天

这节课就给你们一个机会回到我们熟悉的童年世界。”

我的目的当时是，现在依然是，让学生相信哲学是一项自然的活动（a natural activity），正像做音乐和玩游戏那样的自然。即便到了今天，我依然时常遵循这一做法。可以肯定的是，哲学研究有些实际的功用。它对于诸如法律之类的职业提供清晰的思维和强有力的推理。不过，正如诗歌一样，哲学也是它自身的报偿。

我当时是在争取越战期间那些愤世嫉俗者的支持，在这件事上我不敢确定自己有多成功。但我的确清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有一连串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品真正地具有哲学气息。有人愿意听，我就喜欢讲，例如，艾诺·洛贝尔（Arnold Lobel）的《青蛙与蟾蜍——好伙伴》（*Frog and Toad Together*），这本书文字简单流畅，以至于可以归类为“我能自己读”（“I can read book”）系列图书，却是地道的哲学经典（见第九章）。

我慢慢地意识到哲学与儿童存在着关联，下一个步骤自然而然的是写一篇哲学与儿童文学的论文。在一位朋友的催促下，我向美国哲学学会太平洋分会的会务组提交了一篇论文，它被会务组录用。我在旧金山向一大群与会的哲学家宣读了这篇论文。多少有些出乎意料，我发现不只是小学教师，甚至于其他的哲学专家对我揭示的哲学与儿童

文学之间的联系兴趣盎然。于是，我开始非常有兴趣探究儿童的哲学思考。儿童哲理故事的作者们也是痴迷于儿童的哲学思考的。那又让我想起莎拉和跳蚤的故事。

终于我写了《哲学与幼童》一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年），该书的主要论题是这样的：一些儿童自然自发地提问、评论甚至推理，而哲学专家们会认为这些均具有哲学意味。在该书的开始部分，六岁的蒂姆（Tim）问：“爸爸，我们怎样才能确定这一切不是一场梦呢？”这一时刻，他便提出了最古老也最让人萦绕于心的哲学难题之一。“如果这是一场梦的话，那我们是不可能对一场梦做出提问的。”蒂姆后来用这一推理来说服父亲，他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与柏拉图和笛卡尔的解答大有可比之处。

我的非正式研究提出了这样的想法：如此自发的哲学探究在三岁至七岁儿童那里绝非罕见，相对而言，年龄稍大的儿童（甚至八九岁的儿童）的哲学探究反而少见，至少是很少被提到。我的假设是：一旦儿童适应学校，他们便知道学校只期待提“有用”的问题。于是，哲学要么走入地下——或许这些孩子会隐秘地继续在内心思索而不与他人分享，要么便处于完全的休眠状态。

为了让稍大一点的儿童在成人有意激励的条件下，依然富于想象地、充满机智地回应哲学问题，我开发出了自

己编写故事开头 (writing story-beginnings) 的教学技术。在故事开头, 人物 (主要是儿童) 对一些哲学主题或问题充满困惑 (故事中的成人也是如此)。譬如, 弗雷迪 (Freddie) 登上一艘旧船, 它的甲板有百分之八十五被替换过。在船上参观期间, 弗雷迪为自己能走在“最古老帆船”的甲板上感到自豪。但他姐姐听到原船甲板的大部分被一片一片地替换过, 便对弗雷迪的自豪感给以嘲弄。“有百分之八十五的甲板是全新的, 就很难再说它是一艘老船, 再也别把它当成最古老的帆船啦。”她嘲弄地笑着说。我就以这样的怀疑论哲学表述作为我故事开头的结尾。

我带着写好的这类故事开头走进课堂。我问孩子们怎样继续编创这一故事。故事所提出的时间延续中的同一性问题 (the vexing questions of identity through time) 是令人困扰的, 可他们毫不犹豫, 对这一问题热火朝天地进行讨论。原有的那部分在时间延续中逐渐被以新换旧, 于是他们将旧船与同类情况的自行车或小汽车作比较。他们甚至讨论起自己身体细胞的新陈代谢。他们很快就提出, 应以容易识别的部位作为一艘船、一辆自行车、一辆小汽车或人类身体在时间延续中存在的必要条件。

一名儿童可能会说, 当超过一半的船板换新以后, 船就变成新船了。另一名儿童可能认为, 只要最后一块旧船

板还在船上，这艘船依然是旧船。还有儿童会认为，只要有一块船板被换掉，船就是新船。有人则认为要让这艘旧船保持自身的持续性，基本条件是关键部位不能换，或许是龙骨，也可能是桅杆，或者是船舵。有的人则满意于这样的条件，即只要船板的更新是逐渐进行的，并且船继续在熟悉的路线航行，那么船就依然是旧船。

我在国内外的不同学校里使用过编写故事开头的教学技术（story-beginning technique）。我的《与儿童对话》（哈佛大学出版社，1984年）一书就记录了我在苏格兰的一所音乐学校给八岁至十一岁儿童上课时成功使用该教学技术的经历。该书也是以儿童的声音（和心灵！）体现哲学的一部引论。

到目前为止，我谈了儿童就是哲学家这一话题。人们可能从这一话题得出也许存在童年哲学这门学科。怎样会产生这种想法的呢？

幼童（至少是大多数幼童）天生便具有哲学思维，这似乎令成人感到惊异。对成人的惊异进行反思，是我自己认为童年哲学应当是一门学科这一想法的起点。我问自己，我以往所接受的有关儿童和童年本质的什么观念，让我对儿童会自然自发地亲近哲学这一发现感到惊异呢？或许儿童的想法自身在某种程度上是难以捉摸的、充满问题的，

我过去从未赞赏也从未停下来细想一番。

在我的《与儿童对话》一书出版的四年前，马修·李普曼就曾在美国哲学学会的年会上提出，我们可以考虑将童年哲学与宗教哲学、科学哲学、艺术哲学、历史哲学以及许多被人熟知的大学课程里的“某某哲学”科目相类比。

正如人们常常谈论关于上帝、量子物理学、什么算是艺术品或特定历史事件的原因等各种各样具有哲学问题的事物，他们也会谈及关于童年的具有哲学问题的事物。于是，马修·李普曼的建议究其实质就是，我们哲学家应当好好地将注意力转向诸如此类的问题：

做一个儿童是怎么回事？

儿童的思维方式如何不同于“我们的”思维方式？

幼童具有真正利他的能力吗？

儿童可以获得与父母“脱离关系”的权利吗？

儿童的一些艺术作品与某一著名现代艺术家的“简笔画”（stick figures）或油彩斑点画（blotches of paint）相比，在艺术或审美上的感觉是一样的吗？

成人为儿童写作的文学作品，正因为是成人所写，就得是假的吗？

我还记得，起初我反对马修·李普曼的倡议，但很快我便接受了。1985年，我指导了一场题为“童年哲学诸议题”的高校教师暑期研讨会，1988年我又指导了一次。两次研讨会均由“美国国家人文学科基金”（NEH,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赞助。我仔细地选择题目，有意让人觉得我只是简单地从已被接受的研究领域选择常规讨论主题，旨在为了避免向“美国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做一番论证工作，即论证童年哲学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合法的学科，类似于心灵哲学、数学哲学等学科。

这两次研讨会每次各有十二名与会者，每个人都认为，将童年哲学作为合法的研究领域似乎没有任何困难。研讨会从思考我们的童年概念入手，我们发现童年是历史的、文化的，也是哲学的、值得讨论的。

首先，我们的童年概念可能是一项现代发明，因此，从历史上看，我们的童年概念是值得探讨的。在历史上，儿童被视为“小大人”（little people），他当然吃得比“大人”（big people）更少，能干的活也较少，但没人想到去区分他们能领受不同于成人的任务，或者区分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与成人有何不同。

其次，童年概念在不同的文化里有不同的理解，因此，从文化上看，童年概念是值得探讨的。美国人类学家玛格

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告诉人们，在一个太平洋岛屿文化里，各种故事是为成人而不是为儿童创编的。在这一文化里，童年远非处于一个童话的、想象的世界，而是一段务实的乏味的时光。

最后，儿童和成人是不同的人类存在方式。如何说明这种不同，这是真正的哲学难题。因此，从哲学上看，童年概念是值得探讨的。

在这两次“美国国家人文学科基金”的研讨会上，我们所讨论的主题便是本书以下各章的内容。我们谈了理解“做儿童是怎么回事”的可行路径，包括个体人的发展是对人类种系发展历史重演的理论（见第二章）。我们讨论了儿童认知发展理论，尤其是让·皮亚杰的儿童发展理论（见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讨论了道德发展理论（见第五章）。我们讨论了儿童艺术（见第十章）和儿童文学（见第九章）。当然，我们还讨论了儿童权利（见第六章）。

其实，在以下各章中，只有“童年健忘症”（第七章）没有明确列入研讨会日程。但是，这一主题还是不经意间在讨论中浮现出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回想自己曾是怎样的一个小小孩，这是幼年何以如此神秘、如此扣人心弦的部分原因。

由此可见，我对马修·李普曼的建议已经心悦诚服。



对我来说，这是相当清晰的：童年，包括人们对童年的观念和提出的关于童年的理论，的确确实值得在哲学层面上检查和批评。于是，在曼荷莲女子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我第一次教了这门以“童年哲学”为题的课程。

在本书中，我并不试图对“童年哲学”这门学科可能涵盖的内容做全面阐述。我只是对属于童年哲学这门学科的一些议题提出我个人的回应。但是，我提出“一门”童年哲学学科（其实可以说是提出我自己的童年哲学），是希望它成为学术研究、写作和教学中的一个地地道道的领域，并确保它在未来的哲学课程中占有一席之地。